



"التوطين والتغريب" بين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دراسة تقابليه، رواية "موبايل" نموذجاً 阿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比研究，以“手机”小说 为例

إيهاب محمد عبده السقا^١

حسن رجب حسن^١

عبد العزيز حمدي عبد العزيز^٢

أسامة سليم^١

^١ جامع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٢ جامعة الأزهر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can be seen as extensions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but they are not entirely identical. Whil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focus on how to handle form and meaning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 factors and expand their scope to encompass language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American translation scholar Lawrence Venuti, domestication involves "bringing the original author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while foreignization involves "accepting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a foreign text and bringing the reader into a foreign context." Thu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primarily focus on linguistic value orientations, while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re rooted in a broader cultural contex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ve act, but also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exchange activity.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have a clos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summary, language reflects culture; it is not only a vehicle for cultural exchange, but also a tool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f we only focus on the language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n which it depend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appropriately reproduce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language structur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it represents.

从历史上来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按美国翻译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过程和交流互动。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翻译与文化存在着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即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同时，文化对翻译又有一种影响和制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异语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因此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到两种文化。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都离不开翻译活动。直译和意译主要关注在语言层面上处理形式和内容，而翻译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因此，研究时应把视野拓宽到文化的大语境。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虽然是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仅仅是语言层次的探讨，那么，异化和归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探讨扩展至文化、美学乃至政治的范畴。综上所述，语言反映着文化，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工具。如果只顾语言，而不了解语言所



赖以存在的文化，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得体地再现原语言的语用意义。所以我们在翻译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结构，而且要注意把语言 and 它所代表的文化联系起来。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语言层面并认为翻译是只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行为。在20 世纪70 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概念以及翻译研究两大主将比利时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共同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翻译研究从文本转向文化和政治这一现象，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也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异化之争也开始浮出水面。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特指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他们还明确提出“转向文化”的方法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译介学的前景在于如何通过对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思考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深层问题。文化研究的介入为译介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1989 年，在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标志。1990 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所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宣言书。法国当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翻译研究本质和拓宽研究领域的理论并说明任何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而不是原文的“再现”或“模仿”。“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龙金·奈达（Eugene 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美国翻译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此时，归化和异化之争才正式取代直译和意译之争，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对两种翻译策略的称谓。在翻译研究领域首先将这两个词语作为术语使用的是美国翻译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按照 Schuttleworth 和



Cowie 编写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中给出的定义，归化是指译者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尽可能减少译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生疏感的翻译策略；异化则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语言特色的翻译策略。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虽由韦努蒂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 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 1813 年宣读的一篇论文。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两种翻译途径，即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The translator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

异化翻译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即努力做到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风味，使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得以存续，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异域而不惜采用不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异化法的核心是反翻译，以此为中心来进行拓展延伸。也就是说，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者要遵从内心，按照作者的想法来进行翻译，避免语言化占据主导位。这种翻译方式虽然能够完全将作者的想法和风格体现出来，但是却缺少一定的通顺性，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产生障碍。异化法的支持者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形成一种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更加注重表达方式的多样化。

归化法与异化法相反，归化翻译指的是一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翻译，即采用目的语文化所认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规范，使译文流畅、通顺，以更适合目的语读者。归化法的核心理念是贴近自然对等，将服务读者放在核心位置上，确保翻译的内容能够让读者理解，使读者以自然顺畅的状态阅读下来。归化法中尽量将源语言纳入到读者熟悉的文化范畴中，认为翻译的



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交流，因此要在两种文化因素中寻找共同点。简单来说，归化法就是将一些晦涩难懂的译文以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道沟通的桥梁。

下面会总结一下一些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对异化和归化的概念及定义：

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 是归化翻译的倡导者，他重视翻译的交际功能。他提倡“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他后来又用“功能对等”)，如语义对等 (semantic equivalence)，语言对等 (linguistic equivalence) 和文体对等 (stylistic equivalence) 等，他认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 (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 达成功能上的对等。比如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若要求文字对应，应该译成“你的猜测和我的一样好”，但这根本不是原本意思；若求功能对等，可以译成“我和你一样不知道”。译文要达到“动态对等”，不仅译文的表达形式要纳入目的语的规范，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纳入目的语文化规范。按照奈达的归化翻译，中国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以译为“Homer sometimes nods”，而英语成语“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可以译为“对牛弹琴”。具体地说，归化的翻译原则就是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对归化翻译的定义是：“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有意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 (canon) 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韦努蒂的归化定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观，他认为归化式流畅的翻译掩盖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主流文化的当代价值强加给原作，使译作读起来不像译作，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夺行为。刘英凯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著名文章，对翻译中的“归化”策略大加挞伐，但面对英语习语“child's play”，他是该异化为“儿戏”，还是归化为“小菜一碟”，或“轻而易举”？。

刘英凯对归化的概念是这样解读的：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即‘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喻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



则千方百计地英化。刘英凯. 归化——翻译的歧路 [M] // 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加拿大翻译学家罗宾逊 Robinson 对归化的定义是: 归化翻译采用将原作同化于目标文化和语言价值观的方式, 对原作进行归化。传统上人们多将这一概念称为“意译”; 亦称“同化式翻译” (assimilative translation)。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也是美国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积极倡导者。他也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 批判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 并提出了以解构主义思想来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 不是要“求同”, 而是要“存异”。韦努蒂的观点主要在他的专著《译者的隐身》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和他主编的一本解构主义翻译论文集《对翻译的再思考》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1992) 及其《不光彩的翻译》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 之中。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而是要表达这种差异。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 “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 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Shuttleworth & Cowie 根据韦努蒂的见解, 将异化定义为: “在一定程度上为保留原文的异域性 (foreignness) 而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在前人学者如 A. w. von Schlegel,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和 Walter Benjamin 以及 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等人的观点之上, 翻译学者 Robinson 对异化翻译做了最有力的解释: 一个“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原汁原味”。从历史上讲, 这种观点与直译相关联, 只是没有直译派那么极端, 因为它并不拘泥于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中个别词语的意义, 却坚持要保留原文本中的“原汁原味”。有人认为归化与异化与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大同小异。归化和异化可看作是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 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包含了深刻的文化, 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次的讨论, 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伸至文化, 诗学和政治层面”。



简而言之，“归化” (Domestication) 与 “异化” (Foreignization) 是在翻译界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两种对立意见。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一般可分为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or TL culture-oriented) 和以源语文化为归宿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or SL culture-oriented) 这两种原则和方法。归化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异化则主张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这里所谓的“归宿”都不仅仅只是语言层面的，而更是跨文化意义上的。

归化与异化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是不可或缺也至关重要的一对范畴。翻译时，到底是以归化为主还是以异化为主的问题一直是翻译评论家论述和探究的焦点。笔者认为，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翻译时，到底是用归化好还是异化好呢？倘若异化过度，则有可能导致译文的可读性有所降低，难免给人一种“脱离读者”之感，倘若归化过度，则有可能会被人叱之为“偷梁换柱”或“挂羊头 卖狗肉”，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一个充满了无奈与取舍的过程。

首先，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容、思想和风格。而翻译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就能很好地将原汁原味的风格呈现给读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译者，为了让译文达到像原文一样流畅的效果，也考虑到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又会考虑用归化策略。

我们知道，异化和归化策略优势各异，单一地采用归化或异化的原则和方法是不能理想地完成翻译任务的。对于译者来说，什么时候该异化，什么时候该归化，是综合考虑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读者对象以及作者的意图等等。那到底如何选择，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坚持异化翻译，以免造成译文的晦涩难懂，也不能一味地采取归化翻译，只顾将译文纳入目的语文化规范的轨道之中而导致“文化失真”。通过笔者大量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异化和归化比例的划分，不宜划定一个标准，只要掌握一个“度”即可，即异化时不妨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不造成一种“文化错觉”和误解，而归化时则不更改原文的风味，尤其不能导致“文化失真”即可。一言以蔽之，两者交替灵活使用，只要掌握一个适度和分寸原则即可。如此



一来，译文也就成了两者交错运用的结果，归化和异化即并用互补的关系。

在西方，提起直译和意译，远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 (Cicero) 和贺拉斯 (Horace) 等人所论及的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字译，即直译的雏形) 和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意译)。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所解决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直译和意译与文体也有很大关系，在有些文体比如诗歌翻译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如说明文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直译、意译是针对内容和形式而言的，只有当原文内容的表达形式与它在译文中的表达形式不一致时，才有直译和意译的区别。如果同一内容在原语和译语中的两种表达形式一致时，无所谓直译、意译，因为这时二者已经融为一体了。

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 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由于直译对译文在目标语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不太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结构，不是逐字逐句对照，文字比较通顺，因而比较符合译语习惯，读者能看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译文读者也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感受。

意译 (free translation) 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意译不注意原作形式，包括句法结构、用词、比喻以及其他修辞手段。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内容随意删改，或添枝加叶。译者必须深入钻研原文，达到融会贯通，方能抓住要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时原文中的比喻不能为译文读者接受，根据需要更换一个比喻，把原意表达出来，这也是意译的一种形式。



异化和归化与直译和意译是不等同的两对概念。首先，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异化和归化是翻译策略，直译和意译是具体的翻译方法，前者指导后者，也就是说，在异化和归化的指导下，选择适当且相应的翻译方法。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前者是后者在概念上的延伸和承接。异化和归化的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泛，不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如何去处理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直译和意译的范围，而是立足于文化语境之中，将其视野扩充到文化、语言、思维、美学等等众多广阔的领域，并在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异化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接近原文的表达方式，而突破译入语的常规，忠实的传达原文内容和精神，将读者领入异国情境之中的一种翻译策略。异化是在接受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将语言及其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忠实的传达给读者。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同时，也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这是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归化则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以读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译入语的读者靠拢，尽可能地减少原文的异国风味，为译入语读者呈现一种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及文化价值观的译文，这是一种将译文语言本土化的翻译方法，它旨在使译文流畅自如且通顺易懂。

简而言之，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则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源语的语法规则。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强调跨文化交际的问题，直译和意译则侧重于语言层面的问题。具体来说，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直译意译是针对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提出来的，讨论的重点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属于语言层次的讨论。异化归化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也表现在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异化归化将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其次，如果说直译意译是关于翻译技巧或方法的论争，异化归化则是关于翻译策略的论争；如果说直译意译讨论问题的角度较小的话，异化归化则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两者不在一个层



次上，后者指导前者。最后，既然直译意译主要从语言层次这一平面上来讨论问题，那么它们之间的对立性、排斥性便更加明显。异化归化从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层面上来考察问题，可以兼容并存于同一次翻译行为之中，因此，异化和归化除了排斥性和对立性之外，更有兼容性和并存性的一面。概括地说，直译就是在语言层面上向作者靠拢的异化翻译，意译就是在语言层面上向读者靠拢的归化翻译。

在翻译研究中，*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作为两种翻译方法，自古就被争论，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只是在近些年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曾颇有见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为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以往，异化/归化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目前，我们理解的异化和归化是指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上的异化和归化。二者所讨论的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因此把两者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更能明白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更能证明我们的论断：“比之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更能清楚具体地说



明翻译的问题，指导翻译的实践。译界的论争，由过去的直译与意译之争转变为异化与归化之争，标志着翻译理论的升华和提高”。总的看来，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之间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任何试图把它们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理论上都是不恰当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对此，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加以分析，要明确认识直译意译是针对翻译中两种语言的不同结构和特点所采取的技巧或方法，而异化归化是翻译的策略，将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当然，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在谈直译意译时也不能不涉及到文化问题，同样，在实践中，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最终也是要落实到具体语言的应用上。在处理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用“辩证统一”的理论，也要密切关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深入思考在翻译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实践上，我们都要根植于自己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异化与归化的优势与局限性

(1) 异化翻译

根据异化翻译的概念可知，异化翻译通过保留原文的“异质性”，可以使读者感受到外国文化的新奇，而且，由于异化翻译要求既尊重原文的内容与思想，又尊重原文的形式，这就为读者提供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同时也给目标语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有利于促进目标语言及其文化的革新与发展。

但是，异化策略也有其不足之处。过度异化可能导致读者阅读困难，形成心理负担，从而失去继续阅读译文兴趣，最后将无法达到向读者传递异质文化的翻译目的。

(2) 归化翻译



针对上述异化翻译的局限性，归化翻译则追求译文流畅、要求符合读者阅读习惯。归化的翻译作品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与归属感，拉近译者与读者间的心理距离，使读者渐渐走进译者创造的译语世界，以至于读者感觉不出它是翻译作品。

而由于翻译是两国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归化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而当归化现象比较明显时，译文就更接近于是译者的重新创作，而不再是忠实于原作的翻译。这就使得读者读到的仍然是目的语惯用的写作方式，所了解到的也仍然是目的语的文化，甚至连思维方式都仍然是目的语环境下的习惯性思维。过度的归化将导致原作中的异质性大量丧失，使得读者不能较多地从译文中找到新的体验及新鲜感，其结果与过度异化的结果一样，降低了读者继续阅读译文的兴趣。

综上所述，过度的异化与过度的归化最终都将使读者失去继续阅读译文的兴趣，从而影响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的顺畅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互相补充，才能更好地弥补各自的局限性，从而将双方的优势都充分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或者翻译的功能，就不仅仅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事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对“翻译的社会性”的解释如下：“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的翻译意识和翻译行为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译品的成败优劣最后还要得到社会的检验。翻译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翻译工作的社会化。”翻译的社会性反映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历史语言的变迁，更能揭示背后所隐藏的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因素。



另外，如果译者认同本土文化，则以译语和译语文化为出发点。这类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策略，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通过使用一个读者比较熟悉的本土化的术语，使其能够更快更好地理解并吸收术语背后隐藏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之前就受到某种目的的驱使，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希望译作能为广大读者理解并接受，通过译作的社会影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两种不同的语言要找出意思相近、用法相当的对应词较为容易，但要找出内涵及外延全然相等的对等词却极为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地理、文化环境给各自语言中的词汇赋予了各不相同的含义。

翻译时，何时该异化，何时该归化，是译者综合考虑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涉及到包括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具体而言之，包括语言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读者对象以及作者的意图等等。

(1) 影响异化和归化策略选择的宏观因素

影响异化和归化策略选择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

1- 语言文化的差异

由于地理位置、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时也就造成了语言文化的不对称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层面的差异。因为语言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也为译者如何阐述、表达和理解带来了自由空间。与此同时，语言的模糊性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样性，它更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比如同一个词，对它的理解可能会因人而异。二是文化层面的差异。由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因素造成了



文化的巨大差异，而文化与语言又密切相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所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必须反映文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那么，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会影响译者到底是选择“归化”还是“异化”的问题。比如：Go to the law for a sheep, you lose a cow. 有人采取归化翻译，译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有人异化翻译为“官司赢了一只羊，诉讼赔了一头牛”，前者主要是考虑汉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但毫无疑问地“抹杀”掉了源语文化背后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后者则以原文为中心，透视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把西方人的一种强烈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他们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益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忠实的传达给了读者。因此，针对这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考虑的侧重点不一样，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就因人而异。

2- 意识形态的差异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至始至终就难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译者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式方法，它至始至终都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并对二者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与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民族本土文化的同时，必然会对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译者对于异化和归化策略的选择，也制约着两种翻译策略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阶级都不愿接受那些与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异域文化的进入，那么译者翻译他国文化的同时，就不得不考虑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防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一旦存在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文化冲突，译者则有可能对相关内容进行改译或淡化或删除。译者在翻译时，往往会考虑决定选用何种翻译策略，是直接了当，还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



(2) 影响异化和归化策略选择的微观因素

影响异化和归化策略选择的微观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翻译的意图、译者的态度、文本类型以及读者的要求。

1- 翻译的意图

根据作者不同的翻译意图，翻译的目的也会影响归化和异化策略选择。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是想尽可能地把中国文化思想介绍给英美读者，他们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为翻译目的，因此其译本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基本上是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策略。与之相反，霍克斯则有取悦译文读者的倾向，他认为主要以一般的英美读者作为翻译对象，所用他遵循的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策略，所以他的译本则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任何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取都与翻译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转化的翻译也不例外。在中西方许多翻译名家都对翻译的目的进行了种种解释，如：“交际性翻译”、“语义性翻译”、“整体鉴赏性翻译”、“侧重信息内容的翻译”等等。这些分类都很有借鉴价值，无须过多的阐释。众所周知，翻译的目的自身是错综复杂，多种多样，而且它与文本之间紧密相连。

2- 译者的态度

在任何翻译过程中，译者都需要经历阅读和理解文本来表达文本的阶段，译者的角色是读者和再作者的结合。译者更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和审美能力来与文本对话，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译者所站的文化立场不同会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译者对异化和归化策略的选择体现了文化的政治性，尤其是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 and 话语侵略，如果译者处在强势文化的立场，则很有可能通过“归化”来歪曲甚至扼杀弱势文化的某些特征，或者通过诠释、比较和



评论的方式向弱势文化中注入强势文化的元素，以此来彰显其所处的文化立场的优越性，继而无形中注入了强势文化的各种信息。如果译者所代表的文化势力相对弱势一些，但他试图努力维护其语言价值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在他的翻译中就会尽可能地忠实原文的内容和风格，采取“异化”来弘扬其文化的精髓。

3- 文本类型

不同的文本类型具有不同的表达功能，也会直接影响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这就要求译者应该遵循不同的翻译策略原则。诸如中国文学作品，为了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以及源语文化知识，翻译学家则认为，应该尽量选择异化策略。但是有些实用性文本，例如商业广告、户外宣传材料、科技类文章、通知和新闻报道等往往会采用归化策略，这样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信息的有效掌握和理解，也更好地传达了信息的内容。

4- 读者的要求

不论何种译作都需要读者来阅读才能够有其价值，因而译文必须要得到读者的认可，这同样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读者的阅读期待来看，有的读者可能欣赏流畅、通顺、文化障碍少的译文，更多的是适合自己的“胃口”的译文；而有的读者特别希望在阅读中尽可能多地领略异国风情，体味作品当中的“洋味”。从读者心理的要求可以看出，译者在实际翻译中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直接能够影响翻译的效果。这个时候，译者有必要对原文的语言风格、写作背景以及内容信息进行一定的研究，以便对原作和译作的读者群进行一个预测，这样有利于译者确定其翻译标准和策略。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 《阿拉伯汉语互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 《比较文学概论 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第四版。
- 《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4 年 4 月第 1 版。
- 《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 邦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
- 韩加明：《“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中国翻译》，1996。
- 郭建中：《关于直译与惠译的新观念:介绍比克曼和卡洛的(翻译圣经)》，《外语研究》，1989。